

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试论美国与梵蒂冈关系

姓名：包军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国际关系

指导教师：徐以骅

20040501

论文摘要

美国与梵蒂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有关系，无外交”。美国从 1776 年建国开始，到 2004 年 200 多年的时间里，只有短短 70 多年的外交关系。不过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时期，美国和梵蒂冈两国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媒介是美国天主教。

美国与梵蒂冈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中，虽然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有宗教事务和宗教因素，美国是把梵蒂冈当作正常国家来交往的。国家利益是决定种种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

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交之前结成的所谓“神圣同盟”，是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外交关系的润滑剂。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改变了之前不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转而与之结盟。这种意识形态性质的结盟其作用是有限的，结盟对于两国迅速走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一般是隐性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才变得显性，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与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关系中，不能不考虑宗教因素，但是宗教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全面的研究层面。

梵蒂冈（罗马教廷）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也由于其对于教义领导下的各国天主教会的影 响而变得复杂。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反过来也影响到美国天主教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表达，并且也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美梵关系 “神圣同盟” 国家利益 外交政策

分类号：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untry of great religiosity, in which religio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politics. Examining religious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U.S.-Vatican relations will enable u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Combin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with case studies, the dissertation sca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U.S.-Vatican relations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ill the present, particularly the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The American Catholic interweaves th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Vatican.

The so-called "Holy Alli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2-1989, becomes the lubricant of the rebuilding relations of both sides. Despite of Vatican's religious idiosyncrasy,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its state particularity into consideration due to U.S.' state interests.

To be overt or covert, the religious factors work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cases. Whether to be considered as a state or a religious influence, Vatican appears a uniqu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is case, the religious factors are important yet not exclusive.

The dissertation concludes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practical case of U.S.-Vatican relations. The interactions of U.S. and Vatican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religion sill leave enough room to make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U.S.-Vatican relations, Holy Alliance, state interests

Classification Code:

前言

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第三次浪潮》提到几个国际权力中心的作用时, 曾经这样说, 到 80 年代末, 世界上有几个主要权力和影响的来源, 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 在推动着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它们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 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 美国的影响面要大些, 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亚洲, 前苏联的变革搬掉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 没有这些变化, 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¹

亨廷顿的其他观点可以毋庸置疑, 但是他对世界上几个主要权力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主体的判断是有深度的。确实, 对于美国与梵蒂冈这二者来说, 前者是目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后者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双方都在国际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美国立国以来的 200 多年历史里是有交互与合作的, 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

总的来说, 美国与梵蒂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有关系, 无外交”。美国从 1776 年建国开始, 到 2004 年 200 多年的时间里, 只有短短 70 多年的外交关系。不过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时期, 美国和梵蒂冈两国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通过美国天主教这个连接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美国天主教, 在教义上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地位, 在礼仪上采用罗马教廷的规定, 在体制上承认罗马教廷圣统制, 深深受到梵蒂冈教会举措的影响。同时, 美国天主教人数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得到大大发展, 到二十世纪中期逐渐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 对美国的政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美国天主教本身也十分强调美国化、融入美国社会, 它与美国政府和梵蒂冈双方都有密切联系, 也为双方发展外交和非外交的关系提供了条件。

从宗教角度剖析国内国际政治已经成为一个新颖的视角。在这一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 如肯尼思·D·沃尔德 (Kenneth D. Wald) 所著的《美国宗教与政治》²、艾伦·D·赫茨克 (Allen D. Hertzke) 所著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宗教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³、艾力克·O·汉森 (Eric O. Hanson) 所著的《国际政治中的天主教会》⁴、P.C.肯特 (Peter C. Kent) 和 J.F.波拉德 (John F. Pollard) 所编的《近现代梵蒂冈外交》⁵等等。但是就美国与梵蒂冈关系并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 在国内也没有专门的论著。讨论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的相关著作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梵蒂冈角度出发分析罗马教廷外交关系史, 如前述《近现代梵蒂冈外交》, 以及格雷厄姆 (Robert A. Graham) 的《梵蒂冈外交》⁶, 侧重于教会史; 二是从美国天主教角度出发, 分析天主教与美国政治、国际政治

的论著，如前述《国际政治中的天主教会》，以及赫勃格的《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⁷，涉及美国与梵蒂冈关系变化的分析不多。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背景和著述，比如福勒（Robert Booth Fowler）和赫茨克的《美国的宗教与政治——信念、文化与战略选择》⁸，赖克利（A. James Reichley）的《美国大众生活中的宗教》⁹，多兰（Jay P. Dolan）的《美国天主教历程》¹⁰等等。美国与梵蒂冈 200 多年间断断续续的关系，散落于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历史学的著作各章节中，而且因服务于论著的需要而各有侧重。

现有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也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丰富的史料，有助于论文汲取所需的养分；关于美国与梵蒂冈¹¹关系比较全面论述的缺失，有助于史料的总结和观点的创新。本文立足于史料，通过回顾和分析美国与梵蒂冈这 200 多年间断断续续的关系，试图从历史的变迁中发现美国外交的一些特点和宗教（尤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文章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研究的一些理论、美梵两国的影响力、研究两国关系的意义做了分析。接下来在第二章一开始就两国交往中若隐若现的线索——美国天主教会做了分析，然后分阶段分别论述了美国与梵蒂冈交往的过程，着重论述了 1984 年美国与梵蒂冈再度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第三章主要进行个案分析，详细论述了 1982—1989 年间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结成的所谓“神圣同盟”，以及“神圣同盟”所体现的作用。文章的结尾部分是论文的结论。论文最后列出了写作过程中用到的注释和参考的文献。

第一章 宗教与国际关系

第一节 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有近 85% 的人信仰这种或者那种宗教，世界上很多民族也都是从宗教开始自己文明的历史轨迹的，历史上人类社会无论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乃至政治社会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宗教的解释与规范。宗教其实就是一种延续下来的历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长久以来，各种宗教的神学思想除了为信徒提供关于世俗生活的世界观与行为道德标准，还通过对政治、经济等各种世俗制度的理解与态度，影响信徒与现实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在现代社会，宗教仍然用“终极关怀”为在繁荣的科技时代仍有孤独感和有自我渺小的无助感的人类提供心灵的慰藉，而且宗教作为社会群体因共同的信仰而聚在一起的一种内在凝聚力，会给人们提供认同感和归宿感。因而在现代社会，宗教不仅是仍然有效的价值体系，而且还仍然是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政治资源，是“政治人”凝聚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力量的重要的“社会水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存在和宗教现象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存在和政治现象。

那么宗教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呢？

宗教不是空泛的影响国际关系的，说到底这种影响离不开人的因素。现实生活中，“宗教因素”对社会、政治等产生重要程度不一的影响。不过“宗教因素”本身并不能对社会生、政治直接产生支配力或约束力，也不能对来自宗教内外的影响做出相应的反应，必须通过宗教信仰者的行为才能成为社会或政治的活力。一般地说，“宗教因素”的影响通过宗教信仰者来体现，并产生对国家政治的影响的，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宗教信仰者中的宗教界人士（教职人员）来体现¹²；另一类是那些并不具有教职的非教界人士，他们的宗教信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政治观点、处理态度¹³；教会通过政治的压力体系给非教界的宗教信仰者以压力，比如说教会的“院外活动”、游说等等¹⁴；非教界的宗教信仰者在选举等政治行为上为了取悦其他宗教信仰者，会采用宗教语言来寻求认同感，上任后进行政治活动时或多或少的考虑到先前的政治承诺和宗教因素¹⁵。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想、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国家的外交政策、立法和在国际社会中对待宗教、和平等的态度，都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并直接作用于国际关系。这样，宗教通过对国际关系中主体——国家的影响，产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宗教与民族问题被各种政治力量作为各自复兴社会精神、凝聚社会力量的文化认同纽带。宗教与民族、

国家及政治问题交织相伴，使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复杂化、尖锐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经常性地面临由此而来的麻烦和困境。¹⁶过去的研究把宗教因素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来看，认为异质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是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同源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却是不同国家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文化根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化因素日益重要的制约作用。”¹⁷美国著名宗教学者 L. M. 霍普夫在《世界宗教》一书中也深有感慨地指出：“本书的时代象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样，所有的政治冲突都源于宗教纷争，天主教和新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当然这些冲突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宗教分歧作为重要原因给人以深刻印象。”¹⁸宗教上异质或同源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跨国家的国际宗教组织都有别于国家间关系，国际社会对于宗教因素在国际合作与冲突中的考察，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各国政府对于国际形势中宗教影响的估计和采取的对策，是宗教直接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在研究国际问题时，还经常碰到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梵蒂冈研究来说，把梵蒂冈简单归结为一个特殊国家，不去解释它的外交行为，无助于解释一些历史现象和有关梵蒂冈的国际交往。梵蒂冈作为一个特殊的国家，和一般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有不同之处，当然作为一个国家与主权国家也有相同之处。这就决定了对于梵蒂冈这个国家的研究比较特殊。关于罗马教廷主权的性质和功能问题，我们可以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 1979 年 10 月 2 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中看出一二。他说，“这个主权的领土现在限于梵蒂冈城国的范围，但是这个主权本身，由于教皇需要完全自由地执行使命并能同任何一个对话者——即不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自由地处理问题而得到保证。”¹⁹在这里，罗马教廷的主权同与领土和居民联系起来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皇的意思很明白，教廷和天主教会的主权属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国，教廷能以平等的地位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会谈。确实，即便在 1870—1929 年间教廷既无领土也无臣民仍能做到这一点。梵蒂冈的特殊性之一就体现在这里。教廷具有独一无二的双重特性，既是世界天主教会的中枢机构，同时在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又是一个国家。梵蒂冈作为一个特殊的国家，和其他宗教国际组织不一样，梵蒂冈的对外关系成为宗教与国际关系互动的一个特殊实例。

第二节 研究意义

教会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不能小觑，宗教和政治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分开。要从某一个角度同时研究宗教和政治两者，梵蒂冈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的好素材，因为梵蒂冈是世界天主教的政治中心，美国是冷战后仅存的超级大国。取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研究的角度，可以研究宗教力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有什么作用。

一、 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20 世纪末苏东剧变以来，世界上对峙的两大阵营的一方消失了，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解体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只剩下美国这一个超级大国。

早在建国不久，美国就试图发挥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美国试图扩大对加拿大的影响，1812 年美英战争以美国的企图失败而告终。1823 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把拉丁美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欧洲列强干涉。

此后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美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到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加强其在世界上的声音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岸边。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开始试探着在世界政治舞台发挥其影响力。1899 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等地，将触角伸进了太平洋地区。1899 年，美国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其他西方列强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美国参战晚，受到的损失最小而获利最大，战争期间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几乎增加了三倍，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头号债权国，拥有世界上 40% 以上的黄金，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不过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还是遭到了欧洲列强的制约而告失败。

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影响都达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1945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9 年的 866 亿美元猛增到 1987 亿美元。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 54.3%（1948 年），出口贸易的 1/3，世界谷物收获量的 1/3，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²⁰此后美国就一直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形象在世界上辐射其影响力。虽然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和经济增长缓慢，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第一的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是美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 10 年。此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3%，企业盈利率为 10%，股市增长率高达 17%。2000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 9 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了欧盟 15 国的总和。在整个 90 年代，美国经济竞争力连续 8 年保持世界第一。虽然 2001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但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02 年 8 月 12 日发表的全球经济 100 强的最新统计，美国 2001 年 GDP 达到 9.8 万亿美元，美国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23% 跃升为今天的超过 30%。²¹ 目前, 美国经济是仅次于它的日本的两倍。在军事方面美国 2003 年国防支出超过了位于其后的 15-20 个最大的国防支出国的军费总和。²² 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主宰地位, 植根于其全球领先的技术大国的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的数据表明, 美国在研发(R&D) 方面的支出, 几乎与紧随其后的 7 个最富裕国家的研发支出总额一样多。²³

如此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着美国在国际上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 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 是梵蒂冈关注美国天主教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梵蒂冈和美国再次建立外交关系的强大驱动力。

二、 罗马教廷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756 年, 法兰克国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的区域送给教皇, 在意大利境内成立了以罗马为首都的教皇国, 直辖领面积达 4 万平方公里以上, 后来成为西欧教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教皇国是个神权国家, 教皇不仅是世界天主教的领袖, 也是教皇国的世俗君主。1870 年 8 月, 罗马爆发了反抗教皇政权的人民起义, 意大利国王进驻罗马, 意大利完成统一, 教皇权力被剥夺, 并被迫退居罗马城内西北角梵蒂冈。直至 1929 年 2 月 11 日, 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签订了《拉特兰条约》, 意大利认为梵蒂冈这块地方属于教皇, 规定从同年 7 月起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国名全称就叫梵蒂冈城国。梵蒂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教皇是国家元首, 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

梵蒂冈受到世界的重视, 不在于其领土、人口或者经济实力的多少, 而在于其对于世界天主教的巨大影响力。“这个主权的领土现在限于梵蒂冈城国的范围, 但是这个主权本身, 由于教皇需要完全自由地执行使命并能同任何一个对话者——即不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自由地处理问题而得到保证。”¹⁹ 教皇所言非虚。追溯到 1870 年并入意大利之前, 在查理帝国、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帝国期间, 教皇国也都有过被吞并不承认其独立的时候, 但是它对于世界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却并没有因此有所减弱, 因为这种影响力并不纯粹是或不主要是关乎物质方面的, 而更多的是在于精神的影响力层面上。

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 到 2000 年, 全世界宗教徒约 51.37 亿, 占当时总人口 60.55 亿的 84.8%, 其中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约 19.99 亿。²⁴ 同时期数据表明, 罗马天主教在全世界有总主教区 130 个, 共有教徒 10 亿左右, 占全球人口的 17.5%。²⁵ 也就是说, 天主教徒占了全部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人口的一半左右。

另据 1989 年梵蒂冈天主教会统计总局公布的统计年报材料, 从 1978 年到 1989 年的十年间, 全球天主教徒(以领受洗礼为准)增加了 20.9%。²⁶ 由于各国天主教一般都在教义上、礼仪上、体制上向梵蒂冈看齐, 天主教徒的增长, 天主

教义的传播，也显示了梵蒂冈影响力、号召力的不断扩大，这些本身就具有数据和教会机构以外的意义。

三、 美梵关系的研究意义

其实宗教作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因素，已经受到国际政治研究者的一定重视。宗教问题目前是美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在论及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曾说过，“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政治”。²⁷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也曾经说过：“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念之上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至于是哪一种信念我倒不在乎。”²⁸美国政府与教会（宗教组织）的关系或称政教关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广义上的政教关系，除了指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同时还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这两组关系的协调构成了美国宗教与美国政治关系的宏观图景。美国已有越来越广泛的学术界人士开始认为，“‘宗教因素’是了解历史、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²⁹

另一方面，宗教与外交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宗教在本质上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和跨民族性的”。³⁰政治有国界之分，各大宗教生来就是跨国界的，罗马天主教会为其全球信徒的利益会要求各国政府给予必要帮助。宗教的自我界定使宗教团体相当关注本国的对外政策。基于宗教的无国界性，宗教利益团体也比较容易与国外本宗派教会进行沟通或发生“联接”，这使它们往往成为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来源。³¹

美国建国至今 200 多年里，美梵断断续续的关系几经波折。与欧洲旧大陆各大国与梵蒂冈建交的初衷不同，美国几次与梵蒂冈的接触固然是明显地含有宗教事务的因素，但是美国与梵蒂冈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从美国的立场上看，把梵蒂冈视作一个宗教国家还是正常国家，其出发点是明确的。在美梵关系中，美国是把梵蒂冈当作正常国家来交往的，虽然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有宗教事务和宗教因素，美国的这种政治视角是值得分析的。在这种政治视角的背后，是美国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

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交之前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是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外交关系的润滑剂。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的变化，建交对于两国关系都有益处。美国与梵蒂冈建交，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然后再与之结盟。在这里美国不是要把梵蒂冈看作天主教会的中心，而是一个正常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改变了之前不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转而与之结盟。虽然结盟对于两国迅速走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性质的结盟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结盟的深层目的值得分析。

第二章 美国与梵蒂冈的交往过程及其分析

第一节 以美国天主教会为媒介

美国天主教，在教义上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地位，在礼仪上采用罗马教廷的规定，在体制上承认罗马教廷圣统制。清晰的组织结构、强大的等级制传统使几百名主教作为美国天主教的领导能权威地代表天主教会，³²参与美国政治，发挥巨大的影响。美国天主教在美国国内发挥作用，一方面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在教义体制上受到梵蒂冈天主教中心的深刻影响，天然就具有连接美国政治和梵蒂冈教会、为它们穿针引线的禀赋。反过来，美国天主教会在美国国内政治的作用，也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对于美梵关系产生影响；美国天主教会以罗马教廷为教会的最高当局，同时也对罗马教廷产生作用、影响。

一、美国的政教关系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的法律。另外，宪法第六条规定，“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需要说明的是，“政教分离”的原文是“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简言之，“政”指的是国家(state)而非政治(politics)，而“教”则是指教会(church)而不是宗教(religion)。但是对于这“分离之墙”的解释至今还是存在不同的解释，大致有分离主义和调解主义两类观点。分离主义的观点认为，根据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的“在教会和国家中建立起一道隔离墙”³³，宪法第一修正案实质上是规定了美国要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把这道“分离之墙”加高加厚加固。而调解主义的观点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没有禁止国会或各级政府在宗教和非宗教之间保持严格中立，仅仅是排除了政府直接确立或赞同某一特定宗教，政府一定而且应该支持个人和集体的宗教行为。³⁴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则是处于分离主义和调解主义之间。一方面最高法院维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使得美国的任何一个宗教组织都无法作为政治实体干预政治或参与政府决策，并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教派改善自身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前的美国天主教会正是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也表示，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从绝对意义上说，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政府同宗教组织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线远非是一堵墙，而是一个模糊的、不清晰的、因某种特殊关系的所有情况而变化的障碍物。”³⁵所以政教分离的确切含义应该是指国家和教会在机构上的分

离，而不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关于政教分离的条款，并没有规定宗教必须与政治彻底隔绝，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³⁶宗教作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美国，宗教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美国 48 个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18 岁以上的总人口中，自称无宗教信仰的只有占调查人口的 8.2%。³⁷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每 10 个美国人就有 6 个认为“宗教能够解答现在的所有问题或者说绝大多数问题”。³⁸根据美国选举中心 1997 年的调查显示，多达 59.4% 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或者说很重要。美国学者赫茨克指出：“宗教仍然是美国生活和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人民不仅对教会的信心远胜于对其他重要社会机构的信心，而且实际上他们大多数还是教会的成员。”³⁹统计资料表明，1967-1999 年间，美国信徒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没有低于 89%，教会成员所占比例也稳定在 65% 以上（含 65%）⁴⁰。如此庞大的稳定的信教人数，可以看到美国宗教在政治活动中能发挥多么大的影响力。美国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在总统及其信仰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众所周知，美国历届总统宣誓就职时都有手按《圣经》的惯例。根据数据统计，从华盛顿到克林顿全部 42 位总统中，有 38 位是教会成员，其余 4 人也有明显教派倾向。⁴¹另据统计，美国历史上有 11 位总统不是教会成员，但公开表示信仰上帝。⁴²1984 年 1 月 3 日里根总统在一次有关宗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这次仅 25 分钟的讲话竟然被 23 次掌声所打断。⁴³尤其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公开宣称自己是再生基督徒，曾在美国掀起一阵阵宗教狂热。⁴⁴在传教布道问题上，也显得很突出。在美国，牧师们充斥政府各个部门，战时还随军出征。1983 年，美国最高法院以 6 票赞成、3 票反对通过了确定牧师为合法概念，各州可以雇佣牧师并付给其工资。尽管从独立战争开始就有牧师在美国政府部门进行圣事活动，白宫雇佣牧师也不是新鲜事，但那都是非官方的。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使牧师在政府的活动成为名正言顺的行为。⁴⁵另外在美国，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虔诚信徒比同一教派的非虔诚信徒对参与政治活动更积极，更支持教会表达政治观点。福音派虔诚信徒中支持教会参与政治的人从 1968 年的 44% 增加到 1996 年的 75%，天主教虔诚信徒的支持率上升了 25%，新教主流派虔诚信徒中支持率增长了 16%。犹太教徒和非虔诚信徒中的支持率也在上升。⁴⁶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前途不取决于谁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取决于谁坐在宗教原则的办公室里”。⁴⁷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美国与梵蒂冈正式交往前的美国天主教情况

1632年由信仰天主教的巴尔的摩勋爵建立的业主殖民地马里兰是天主教徒的主要移民地。出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巴尔的摩父子在该殖民地首先确立宗教宽容政策，颁布了1649年宽容法，该法1654年被取消。1691年马里兰被改为皇家殖民地，英国国教会成了官方教会。1718年，天主教徒在马里兰被剥夺选举权。同一时期，除了马里兰外，天主教徒还移居到其他州，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州的宗教自由和纽约州的宗教多样性，也是天主教徒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证。独立战争爆发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天主教徒和绝大多数教会一起，都支持殖民地事业。独立战争期间，启蒙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促进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的观念的传播，宪法的颁布体现了这些观念。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宣布国会不能制定法律确立一种国教或者禁止信教自由，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国家。1803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娜后，新奥尔良成为第二个天主教重要中心。1848年美国获得新墨西哥州，这是第三个天主教中心地。而构成日后天主教重要组成部分的天主教移民，则在19世纪中期大批来到美国。

三、第一次建交后的美国天主教情况

19世纪中期大批天主教徒移民美国，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天主教徒的数量，壮大了声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即便天主教徒人数激增，天主教在信仰新教为主流的美国，仍然是处于明显弱势的。由于新教本土主义影响，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存在很大偏见，认为天主教徒受罗马教廷控制，因而是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威胁。同时大量天主教徒的涌入，造成对底层新教徒职业冲击，引起这部分新教徒的反感。另外还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等等，也造成对普遍处于较低、边缘社会地位的天主教徒的排挤。19世纪中后叶，面对大量天主教移民的冲击，以新教徒为主的美国社会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仅在19世纪40、50年代的反天主教暴乱中，贬斥天主教的言论著作就多得不可胜数。从1800年到1860年，美国至少出版了25种日报、周报、双月报，还有13种月刊和季刊，散布传播反对天主教的言论。⁴⁸此外，美国与梵蒂冈第一次外交关系的终结也与此不无关系，美国国会决定停止给美国在梵蒂冈的使馆拨款，就是出于新教徒强大的反对压力。

新教徒的过激反映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从1820年左右起，天主教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教皇制度得到了巩固。对于天主教来说，这必然意味着教会越来越以罗马为中心，以教皇为中心。这种趋势不断加深，到19世纪末，失去教皇国领土的梵蒂冈依然成为教会完全的神经中枢，教皇穿着永无过错的法

衣，恢复到几至中世纪的那种权力地位。对于大量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移民的巨大冲击，对于这么多处在梵蒂冈影响之下的不知其细情的人群，对于还是罗马教会下的子教会的美国天主教会，新教徒惶惶然是必然的：“人人都知道，教皇的眼睛里是盯着美国的，因为，如果能够移居密西西比河谷，谁还愿住在衰败腐朽的罗马呢？”⁴⁹

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天主教来说，首先为了求得社会认同，十分强调融入美国社会，在这一点上与教皇的政策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面对大规模反天主教的情势，当时拥有近千万信徒的美国天主教会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自由进行反击。吉本斯（James Gibbons）主教指出：“一千六百万天主教徒拥护（美国的）政府体制……在这个国家里教会与国家的分野，……对国家与教会两方面都有好处”⁵⁰，他表示天主教反对任何在美国实行政教合一的设想，这是美国天主教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对消除美国新教徒对天主教的疑虑产生了很大的作用。1928年，纽约州州长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尽管史密斯最终没有当选总统，然而这一提名可以说已标志了美国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标志着美国天主教正在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团体之一。但是，史密斯的宗教背景还是遭到了保守派新教徒的强烈反对，还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反天主教高潮。在那一年总统选举中，为了保持“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的主宰权”，不让天主教徒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当选，新教极端派掀起了一波反天主教的浪潮。在10月总统选举前夕，《基督教世纪》杂志上一片文章认为，基督新教反对一个天主教徒作为美国总统不是因为基督新教徒想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他们坚定的基督新教徒，不是因为他们不欣赏天主教的崇拜方式，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担心史密斯当选总统后会发表命令服从教皇，而是因为天主教与美国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长期以来，天主教势力及其影响在美国不断扩大，已经威胁到美国业已存在的制度。如果白宫出现一个天主教总统，罗马天主教体制将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明显增加，因而将使人们再次面临“美国还是不是基督新教和盎格鲁-萨克逊的美国”的问题。⁵¹当时，基督新教徒处在美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把天主教徒移民当作外国人，天主教徒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没有进入主流社会之前对此无法抗争。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艾贝尔提出，长老宗、浸礼宗和循道宗3派应该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去改变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其目的是“推动美国化的进程，改变天主教徒孤立于美国社会之外的问题并把他们带进新教教会。”艾贝尔认为，“美国政府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美国的社会生活都是来自于基督新教并由基督新教所支撑的。”⁵²可见，在当时还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天主教会没有被当作美国的宗教看待，也没有机会融入美国社会主流之中去。新教禁酒同盟在

其帮助胡佛（Herbert C. Hoover）竞选的声明中也这样说道：“如果你坚信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的主宰权；如果你支持对入境移民的限制，那么你就选举（新教徒）胡佛，而不是施密斯。”⁵³结果，在诸如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当今美国最危险的敌人”、“投票给艾尔·史密斯就是投票反对基督”⁵⁴这样的反天主教叫嚣中，选举的最终结果是施密斯由于新教极端势力的阻挠而惨败给了胡佛。

20世纪50、6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模式从原来的WASP模式转变为PCJ模式，即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模式⁵⁵。随着梵蒂冈政策的明朗化、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美国国内对于天主教的认识更加清晰深刻，威胁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看法逐渐消散。同时美国天主教强调融入美国社会、求得社会认同和进行自我正面宣传的策略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于美国天主教的歧视逐渐消失。并且随着美国经济获得的巨大成就保持了失业率的稳定，天主教徒在经济、政治各个方面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天主教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作为新的美国天主教时代的开端，肯尼迪（Kennedy）的当选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宗教自由宣言这两者之一成为划时代的标志。⁵⁶1960年约翰·肯尼迪作为天主教徒当选美国总统，象征着天主教已全面进入社会的主流。

四、美国天主教现状

虽然在美国新教徒人数最多，但新教教派林立，教徒分属不同教会，各派教会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相比之下，美国天主教最为一个统一的教会整体，规模、实力最大。目前，美国天主教是全美最大的单一教派，拥有47199名神职人员和6200万信徒，占全美人口的26左右%。⁵⁷

进入美国社会主流后，天主教在美国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就国会议员的宗教信仰来说，有近三分之一的信奉罗马天主教。⁵⁸这个比例略高于天主教占美国社会的人口比例。以104届国会为例，90%以上的国会众议员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33%为天主教徒。（145位）⁵⁹在105届众议院议员中，有275位新教教徒，122位天主教徒，33位犹太教徒，还有5位拒绝说明自己的宗教倾向。⁶⁰参议院的比例大致相同。信教议员分布也有一定规律，纽约州一般以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议员为主。从下面1967年和1996年的国会议员宗教信仰表可以看到，天主教徒的比例是最高的，30年来增长了近6个百分点。作为最大的单一教会，这支力量是巨大的。

表 1: 各宗教家族在国会和州长职位中所占地比例 (1967 年)

参议院		众议院		州长职位	
1.卫理公会	24%	1.天主教	22%	1.卫理公会	20%
2.圣公会	15%	2.长老会	12%	2.天主教	18%
3.天主教	13%	3.卫理公会	16%	3.圣公会	16%
4.长老会	12%	4.圣公会	12%	4.浸会	12%
5.浸会	12%	5.浸会	10%	5.长老会	10%
6. 联合基督教会	6%	6.联合基督教会	5%	6.联合基督教会	10%
7.摩门教	4%	7.犹太教	4%	7.信义会	6%
8.信义会	3%	8.基督会	3%	8.基督会	4%
9.神位一体一普救派	3%	9.信义会	2%	9.摩门教	4%
10.犹太教	2%	10.摩门教	1%	/	/
其他	6%	其他	9%	其他	0%

资料来源: Edwin S. Gaustad: "America's Institution of Faith: A Statistical Postscript," in William G. McLaughlin and Robert N. Bellah, ed., *Religion in America*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1968), p.125.

表 2: 国会议员的宗教归属 (1996 年)

	众议院	参议院	总数	百分比	%变化 (1960 年以来)
天主教	127	24	151	28.2	+40
犹太教	25	10	35	6.5	+192
摩门教	11	4	15	2.8	+114
新教徒 (总数)	245	57	302	56.4	-28
浸会	58	9	67	12.5	+5
圣公会	31	11	42	7.9	-34
信义会	17	5	22	4.1	0
卫理公会	46	13	59	11.0	-40
长老会	43	10	53	9.9	-21
神位一体一普救派	2	1	3	0.6	0
联合基督教会	2	6	10	1.9	-63
未指明教会新教徒	44	2	46	8.6	+92

资料来源: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anuary 8, 1960);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anuary 4, 1997), 29; 转引自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 Strategic Choices*, p.124.

以上二表另可见徐以骅:《美国宗教的路线图》, 载《宗教与美国社会》, 2004 年

相同教派议员还会在一起共进早餐,许多宗教组织也想利用这一时机派游说人士去接近议员,希望通过宗教纽带影响某些政策,这些游说行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影响力相对不大。⁶¹不过,议员们的宗教信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政治观点、处理态度。比如1964年在教会支持下制定的《民权法》,1984年6月通过的《平等使用权法》,1998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简称IRFA)⁶²,一方面是国会议员在投票时带有其所属宗教的特定思维产生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团体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游说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主教作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在这些宗教团体中也是活跃和突出的。2000年天主教会和主流派新教徒团体成功地争取到国会拨款4亿美元以减轻穷国债务,也是一个成功的例证。这些都是隐性的宗教因素在一定时期的显性表达。

就美国天主教自身跻身于美国政治与国际舞台来看,也是有较长的历史了。1919年天主教会在华盛顿设立“全国天主教福利理事会”(“美国天主教会议前身”)来处理 and 应对公共政策问题。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美国天主教一反梵二会议前独善其身的惯常做法,以关爱生命前后一贯的立场,空前积极地介入从美国经济、生命权到冻结核武器等美国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政治动员。天主教主教团发表的关于核战争和国内经济的牧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美国地方上的宗教组织越来越被许多人看作比政府机构更有条件来对付诸如家庭破裂、贫困、酗酒、吸毒之类的问题,而天主教会及其地方组织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旗帜鲜明的,出于相同教义和教义上的领导,罗马教廷对于这些问题是关注的,和美国天主教会是有切实的联系的。

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美国天主教作为两者之间的连接点,从多个层面发挥过作用。例如,宗教界人士(教职人员)在一些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再如,非宗教界人士(教职人员)的信仰者,比如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参与“神圣同盟”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他还有像前面提到的梵二会议之后,美国主教团发表的关于核战争的牧函和美国天主教积极参与冻结核武器的运动,也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这些后文还会分析到。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有些作用是不为人知的,因而这一连接也是若隐若现的。

第二节 1784—1984 美国与梵蒂冈关系

一、立国到建交——美梵邂逅

美国与罗马教廷正式的交往,始于18世纪末期。1784年12月15日,教皇驻巴黎的代表宣布,教皇国同意向新生的合众国商船开放地中海的两个港口——契维塔韦斯亚和安科纳。同时,为便于双方的交往,美国与罗马教廷决定建立

领事关系。

1797年，美国任命在罗马出生的约翰·萨托利为驻教皇国的领事。1826年起，教廷也向美国派驻领事官员。随着美国国内天主教徒的不断增长和美国在海外势力的增长，美国日益重视国际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重视和它发展双边关系。

二、1848-1868——短暂的蜜月

1847年，美国第11任总统民主党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决定将美国驻梵蒂冈领事升格为公使，并在罗马建立正式外交使馆。从档案资料来看，美国总统的这一外交举措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1847年12月7日，波克尔向国会提交咨文说，国务卿已向他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估算了和教皇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费用。总统认为，“教皇国正在发生有趣的政治事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和有关的经济利益，我认为是时候和教皇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了，这一措施对我国是有利的。”⁶³总统拨款建立外交使馆的提案以压倒性的多数在众议院（137:15）和参议院通过。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正如美国波尔克总统在咨文中说的，美国在罗马设立公使，是出于政治和经贸的考虑，而没有关心任何宗教问题。美国政府不关心天主教的教会事务，也无权干涉这些。美国与梵蒂冈建交的情况是少有的，很可能是特有的和教皇国的外交关系，这种外交关系仅止于教皇的世俗权力。其他国家的情况一般是，宣布与教皇建交是出于世俗统治，但实际上主要是对教皇的宗教权威感兴趣。在美国参众两院进行辩论时，都认识到教皇具有双重身份——宗教领袖和世俗政治首脑，但一致认为美国要和教皇打交道的是后一种身份。1848年5月国务卿布坎南（Buchanan）给第一任临时代办的指示定下了这一时期关系的一种基调。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与教皇交往中，有一点必需谨记。大部分国家和罗马教皇的外交关系维系在教皇是天主教的领袖上。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它对于任何宗教问题都不干涉。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派都站在同一起点，每个人都有享有他良知所信奉的崇拜他的上帝的宝贵权利。因此你只需与教皇国努力发展最友好的民事关系，发展两国间的贸易，你要小心避免那些哪怕是表面卷入美国或其他地区教会事务的事件。如果你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好建议，请在某个适当场合向教皇透露这些信息，使他知晓我们的立场，这样在这方面就不会有错误或者误解发生了。”⁶⁴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美国驻梵的外交事务偏离这一指示。对于年轻的教皇来说，美国的商贸看起来相对不重要，他正想领导意大利和欧洲的政治改革，美国的支持有所裨益。而在美国看来，通过罗马这个中心，美国能和意大利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发展更宽广的商贸关系。地中海地区，对于欧洲来说，自古以来就是商业发展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

第一批拨款本来是打算建立临时的代办处，但是不久美国就派驻了常驻公使。1848年8月，首任美国驻教廷公使到任，其外交等级高于代办，低于特使。不巧的是，美国国内的情况不利于美国天主教，到1850年，主要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浪潮使天主教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于是在主流信仰新教的美国社会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美国国内多数人信仰新教教派，也强烈反对教权主义。在这种背景下，1867年，美国国会决定停拨维持美国在教皇国的使馆费用，同时撤回驻教廷的公使。1868年3月，美国驻梵使馆完全关闭。

三、1868—1895——非正式关系的绵延

1870年教皇国被并入意大利，宣告教皇世俗政权终结，但美国政府仍然承认梵蒂冈驻美代表路易斯·宾奇（Louis Binchy）的外交代表身份，不过在教皇国失去了领土和海港之后，政治商贸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美梵第一段正式外交关系的命运已经注定。

1895年随着宾奇去世教廷没有派人接替，美梵第一次外交关系就此不了了之。但这并非意味着美梵双方关系全部中止，事实上在教皇国灭亡之后，教廷利用教皇在天主教中的地位，向各国教会派出教皇代表，称“宗座代表”，宗座代表虽不是外交官，但至少可以在宗教方面保持和各地教会的联系。从1893年起，罗马教皇通过向美国派驻宗座代表、美国天主教巴尔的摩大教区红衣主教吉本斯，继续与美国保持联系，梵蒂冈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衰弱，尤其是教皇对美国天主教会仍有比较强大的影响力。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的通谕促进了美国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19世纪下半叶在巴尔的摩主教等人的领导下，美国天主教自身作出了适应美国社会文化的种种尝试。但在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干预下，在世纪之末中断了使教会美国化的努力。不过，到1908年，美国天主教会不再隶属教廷传信部的管辖，从而结束了子教会的地位。梵蒂冈——美国天主教会——美国国内政治这条线索正式形成了。

四、1895-二战前夕——美梵冷淡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梵蒂冈与美国政府的联系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宗教界人士（教职人员）来进行的。吉本斯主教和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塔夫脱（William H. Taft）等几位总统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教廷与白宫之间的联络，特别是美西战争期间双方的协调和沟通，往往由吉本斯以个人身份秘密进行，美梵秘密外交由此开始。⁶⁵

1913年上任的威尔逊总统坚决反对教权主义，为了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自身利益，美国并不希望教皇扩大在拉美的影响。美梵在1915年墨西哥革命中的利益不同，天主教会的势力遭到了打击，美国却希望自己能控制对拉美的影响，

所以教廷通过吉本斯说服威尔逊向墨西哥政权施压的努力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与梵蒂冈有了接触的可能，但是梵蒂冈自大的态度使威尔逊政府退避三舍。一战双方都怀疑教廷是另一边的工具，而梵蒂冈的态度是有偏向的而并非其宣称的中立，梵蒂冈确实劝说美国政府停止向协约国出口食品、军火武器和贷款。这并不和美国的政策相符，所以两者关系更趋冷淡。一战结束后，因为意大利在 1870 年以后一直反对“罗马问题”国际化，限制梵蒂冈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和影响，所以梵蒂冈为了恢复 1870 年失去的影响力和威望，改变它与意大利的关系，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对 1871 年保障条约更正式的国际化的保证，极力想参与在巴黎的“和平会议”，但是教皇的要求被美国和协约国拒绝了。为了美国与协约国的关系和美国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实际利益，以及 1920 年的总统选举争取新教教徒和反教权主义者的支持，威尔逊总统同意将罗马教皇排除在和会之外。

20 世纪初，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双方没有太多的共同利益作为双方关系的支撑点，因而难以走到一起。

五、 二战—1983——美梵亲近而不亲密

不过，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选美国总统前后，美国与梵蒂冈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28 年，史密斯败选美国总统选举，这一选举“在构筑新的美国选民组合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⁶⁶。它使天主教徒和民主党的联合更加紧密，成为支持罗斯福的“新政联盟”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选票帮助罗斯福四次当选美国总统。1933 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开始推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国内矛盾，反过来也得到美国天主教会的支持。“新政联盟”在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了三十年，使民主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政治中的多数党，也为罗斯福的“新政”和外交政策减少了阻碍。天主教徒是罗斯福几度当选美国总统的两大支持支柱之一。⁶⁷据统计，白人天主教徒在“新政联盟”中贡献了超过 1/3 的民主党总统得票。⁶⁸

当时在天主教领导层中力主支持“罗斯福新政”的著名人士有芝加哥大教区的红衣主教芒德莱恩（Mundelein）和波士顿的辅理主教斯佩尔曼（Spellman）。他们非常清楚梵蒂冈需要和美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也非常清楚美国迫切希望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努力促成美梵双方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1936 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的第二天，斯佩尔曼便安排了梵蒂冈国务卿巴采利红衣主教在海德帕克秘密会见罗斯福总统，双方商谈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再次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急于想与梵蒂冈建交，对于法西斯日益严重的压力，美国更加关心的是教皇对德意法西斯政权的态度是不

是和美国协调一致。

1937年3月14日，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发表了谴责德国纳粹主义的通谕。5月芝加哥大教区的红衣主教芒德莱恩在向教区神职人员讲话时称希特勒为“愚蠢的开空头支票的骗子”，梵蒂冈面对德国提出的强烈抗议，声称芒德莱恩向手下讲话有言论自由，教廷无权干涉，德国宣布召回驻教廷大使。此时，美梵关系有了进一步接触的契机。芒德莱恩作为梵蒂冈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中间人不断活动，引起德国报纸敏感地预测美梵将建交。1939年巴采利主教当选为新的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XII），罗斯福总统派遣美国驻英大使参加其加冕典礼，给予新教皇以美梵关系史上最高地礼遇，罗斯福以此为探测气球，试探公众对美国与梵蒂冈建立某种类型的关系有什么反应。二战爆发后，美国竭力阻止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和梵蒂冈反对意大利再作进一步扩张的立场吻合，利用梵蒂冈中立国地位收集欧洲的情报，尤其是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参战以后，更加显得有重要的意义。1939年底，罗斯福派梅隆·泰勒（Myron C. Taylor）为总统驻教廷的“私人代表”，美梵关系更近一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梵蒂冈的政策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这与泰勒在罗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种非正式的外交关系由泰勒维持到1950年。⁶⁹

另一方面，在二战之前宗教组织对外援助问题本身就具有某种政治色彩。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经常与反天主教问题联系在一起。战争开始后，在天主教参加战争基金会问题上再次发生争执。美国天主教成立了“天主教全国福利会议战时救援服务会（War Relief Services of the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1942年，白宫和天主教战争援助会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多次商谈，探讨天主教在美国和梵蒂冈的地位问题。其实质是美国政府试图在对外援助问题上与天主教组织合作。二战结束以后，大约有1000万欧洲难民需要援救。那些私人宗教组织除了继续诸如帮助难民们重新定居、遣返，照顾无家可归者之外，开始积极进入立法领域并接受新的正规的政府援助方式。同时，私人援助组织被迫对和平时期以国家安全为目的与人道和宗教目的的关系等新问题加以考虑。1945年，杜鲁门（Harry S. Truman）入主白宫以后不久，美国成立了“驻德注册救援理事会（Council of Relief Agencies Licensed for Operation in Germany）”。该组织的25名代表中有17位来自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犹太教自1950年起加入该组织）。美国军事当局帮助这些组织训练海外人员并与之合作。美国天主教再次在美国和梵蒂冈两国之间搞好关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1950年泰勒辞职后没有继任者，美国总统杜鲁门从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希望教皇对美国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反对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给予更多的支持，提名新的美国驻梵蒂冈大使，企图实现美梵关系的正常化，但是遭到

了美国国会和宗教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因为当时美国天主教还没有完全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对天主教的敌视依然存在。另外一些人认为战争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再与梵蒂冈协调一致，于是美梵建交问题被搁置一旁，此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三位总统在改善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方面也没有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后美国与梵蒂冈关注的重点不同。梵蒂冈首先关注的是各国教会发展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天主教会的发展，而美国关注的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和苏联争霸，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之后，教皇曾经多次公开或含蓄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给美国政府带来国内外的压力。1970年7月，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为了改善美梵关系，仿效罗斯福恢复向教廷派驻“私人代表”。9月尼克松访问梵蒂冈争取教廷的支持遭到冷遇。1977年，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将“私人代表”升格为“总统私人特使”，美国摆脱了越战的窘境，美梵之间的分歧逐渐消失，双方在所谓捍卫“人权”的目标和反对共产主义“迫害”教会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1979年10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美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和平和人权问题的演讲，继承了近几任教皇在联合国总部讲坛上的传统活动。

1981年底，当波兰发生军事管制的时候，梵蒂冈和美国不约而同地帮助团结工会，并在1982年结成了所谓的“神圣同盟”，美国把梵蒂冈视为正常国家，通过合作逐渐走近，并在1984年再次建立外交关系。具体分析将在下面进行。

第三节 1984—2004 美梵步入稳定的外交

一、美梵外交关系正常化国内阻力的减小

美梵外交关系正常化有几个阻力，前文已经分析到了。一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量移民带来巨大的就业冲击和文化冲突，使底层和中层的非天主教徒感到恐慌和排斥，反天主教的浪潮不断，这种排斥直接给美国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随着美国进入二十世纪，综合国力成为全球第一，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除了经济大萧条期外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就业冲击逐渐平缓下来。移民带来的移民文化，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面杂糅了大半个世纪之后，已经融入美国的文化之中，不再是显著的问题。天主教徒在经济、政治各个方面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作为个体不断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为天主教整体进入社会主流做好了准备。

与社会层面的排斥歧视相比，更难改变的是思想层面的排斥和歧视。为了改变新教徒对天主教的看法，美国天主教做出了不懈地努力。自吉本斯主教在第一次反天主教高潮时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自由作出应对和声明开始，美国天主教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上不断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美国天

主教强调融入美国社会、求得社会认同和进行自我正面宣传的策略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天主教的认识加深，那种认为天主教威胁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看法逐渐消散。二十世纪初，美国不再作为梵蒂冈的子教会，获得了独立性，这一关系的改变，有利于天主教会更好、更自主地融入美国社会。1960年，天主教徒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第一位天主教总统，打破了历届总统都是新教教徒的传统，对于美国天主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象征着天主教已全面进入社会的主流。美国天主教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塑造所谓的美国方式上，天主教和犹太教已经能和新教主动分享一度被新教占据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使新教徒接受天主教徒的影响因素是下面要谈到的梵蒂冈政策的改革。

二、梵二会议的影响

面对当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也进行了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天主教改革的重要标志是1962—1965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教会的自我革新”和“适应时代形势”。可以说，天主教在近两千年的教会史上，要数近几十年来的变化最深刻。梵二会议的改革成果首先是对现实世界作出了积极评价，确认了人对现实世界的作用，强调来世的希望并不应削弱人们对现世应有的责任感，教徒们应积极加入为世界服务的行列。其次，在体制、神学、礼仪等方面进行改革。第三，也开始倡导基督徒合一运动，改变了过去唯罗马教廷独尊的立场，教皇对历史上造成的教会分裂也作了检讨，教廷撤销了对东正教的绝罚令，对新教各派也强调了共同信仰基督的一致性。第四，强调要尊重其他宗教，提出教会也要向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开放，认为任何宗教信仰，只要严格遵照伦理道德规范生活，都可获得“永生”。第五，提倡同全人类对话，明确表示要同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对话。

梵二会议的改革措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成为美国天主教会介入美国政治的新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最终赋予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上更大的自主权。它要求“各国天主教会要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道德纬度”。“梵二会议”后，美国天主教在政治上开始采取灵活而务实的政策。和梵二会议前独善其身的惯常做法不同，美国天主教以关爱生命前后一贯的立场，空前积极地介入从美国经济、生命权到冻结核武器等美国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政治动员。“梵二会议”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罗马教廷在处理其与各民族国家及其教会的关系上也有与以往不同的明显改变。如在政教关系上，罗马教廷不再强调和坚持政教合一的传统立场，而正视

并承认许多国家的政教分离的客观现实或其必然趋势。⁷⁰这从根本上消除了美国新教徒对于美国天主教可能改变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担忧。

三、美国与梵蒂冈再度建交

美国国内反对与梵蒂冈建交的阻力减小，罗马教廷在“梵二会议”之后处理其与各民族国家及其教会的关系上也有与以往不同的明显改变，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美国天主教在国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和更大的影响力，以及以美国与梵蒂冈建立的所谓“神圣同盟”作为润滑剂（这一点将在下一章展开分析），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美国认为，与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有利于加强双方“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努力”，⁷¹“梵蒂冈是国际关系的敏感焦点，它也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教皇若望·保禄精神和品质的引领下，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力量。”⁷²1983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建交的提案。根据1984年初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7%的美国公众支持里根总统的建交政策，79%的天主教徒和48%的新教徒都明确表示赞同。⁷³

1984年1月10日，美国与梵蒂冈经过反复讨价还价，终于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里根总统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分别将各自的“私人代表”任命为大使，美梵外交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梵建交的背景，与其说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如说是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美国想通过罗马教廷和教皇在全世界的影响，巩固自己在争夺世界霸权中的有利地位。梵蒂冈看重的则是拥有庞大财力的美国天主教教会的支持。美梵建交客观上提高了美国天主教在国内的地位，教皇本人也增加了同白宫打交道的筹码。

事实上，美梵建交也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梵蒂冈关注的“生育流产”问题，里根政府作出了让步，同意改变其援助计划，与梵蒂冈的“反对人为控制孕产”的宣教保持一致。1984年美国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上宣布，撤销给予世界最大的家庭计划生育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FPA）的资金。1984年第一任驻梵大使威廉·威尔逊说，美国国务院最后勉强同意完全禁止美国的援助基金用于任何国家与国际卫生组织推行人口控制或流产。“因为梵蒂冈不同意美国的政策，所以这些政策做了改动。美国的援助计划和梵蒂冈的家庭计划标准不符。”美国作出了让步。在黎巴嫩问题上里根政府也采用了符合教会利益的政策。⁷⁴而作为回报，梵蒂冈没有对尼加拉瓜的战争作官方表态，教皇只是在发表的和平呼吁中含蓄地批评了美国延长冲突的政策。

四、前后二次建交的比较分析

几经波折，美国与梵蒂冈在间隔了一百多年后，再次建立外交关系。在这美

国与梵蒂冈两次建交的过程中，什么是美国与梵蒂冈建交的根本原因？

答案是明确的：美国在建交过程中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而非简单的考虑梵蒂冈在世界天主教会中的宗教影响力，即美国并非把梵蒂冈简单看作一种宗教势力，而是基本上是把梵蒂冈看作一个具有巨大的宗教影响力的正常（主权）国家开展外交，通过一定层次的合作关系来利用梵蒂冈的软硬权力，达到自己的全球战略目的。外交的宗旨无非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对外活动来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提高国际地位。决定外交政策目标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利益，其他主要因素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环境。美国与梵蒂冈两次建立外交关系正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次建交时，美国的国力还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重视拓展对外贸易是当时美国的主要利益所在，也是美国总统波克尔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与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出发点。“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和有关的经济利益，我认为是时候和教皇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了，这一措施对我国是有利的。”⁶³ 在美国参众两院进行辩论时，议员们都认识到教皇具有双重身份——宗教领袖和世俗政治首脑，但一致认为美国要和教皇打交道的是后一种身份。对于使馆的指示则是“只需与教皇国努力发展最友好的民事关系，发展两国间的贸易，你要小心避免那些哪怕是表面卷入美国或其他地区教会事务的事件。”⁶⁴ 在美国看来，通过罗马这个中心，以及罗马给美国商船开放的两个港口，美国能和意大利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发展更宽广的商贸关系，这才是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宗教影响不是美国第一次与梵蒂冈建交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1984 年建交时，美国考虑的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不过这一次宗教因素在美国建交的考虑中有所体现。20 世纪 70 年代，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全速发展核武器，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并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泥潭的机会，加紧在世界各地扩张，推行全球性攻势战略，而美国转为防御态势。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力图改变美国在 70 年代同苏联争夺中不利的局面，恢复美国在西方和整个世界的霸主地位，梵蒂冈正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合作伙伴。出生波兰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天主教世界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天主教会都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正是美国影响力比较弱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宗教因素比较突出。此外，美国使用财力物力支持东欧国家的一些政府反对派所需的渠道、信息等，就不能仅仅用宗教因素来解释了。比如在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上，很多物资、机器、金钱都是通过教会系统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入波兰的，一些设备偷运入波兰也是通过教会力量进行搬运转移的，部分的情报信息也是通过教会系统流出波兰的。

从两次美国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来看，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决定的。第一次建交美国看重的是能获得经济政治利益，第二次建交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的目标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然后再与之结盟。虽然在第二次建交过程中宗教因素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结盟的外交政策决不仅仅是看重梵蒂冈的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力量，不是把梵蒂冈看作一种天主教宗教势力，而是看作一个平等的正常国家。在合作过程中梵蒂冈也发挥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作用。

四、 1984 建交以后

在里根和布什任期内，美国与梵蒂冈的“神圣同盟”合作平稳。苏东巨变之后，“神圣同盟”自然也就终结了。1990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与梵蒂冈的立场不同，梵蒂冈主张外交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战争，不过这种外交声明并不对美梵关系产生影响。克林顿政府和梵蒂冈的关系比较冷淡，1994年开罗举行的联合国人口发展大会上，美梵各执一见。⁷⁵这一次克林顿政府并不像里根政府那样愿意作出让步，美国坚决赞同“支持妊娠可以中止”的开罗宣言。⁷⁶尽管有时意见相左，美国和梵蒂冈在推行世界宗教自由、宗教间相互容忍、人权等方面都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立场。“9·11”事件后，梵蒂冈对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给予大力支持。而作为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和人权的考虑，梵蒂冈也赞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在对伊核查前后，梵蒂冈发表的声明都强调攻打伊拉克需要联合国批准，而不赞同美国单方面的行动。今后美梵关系的趋势，必然是像美国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关系一样平稳发展，在一些问题上梵蒂冈注意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附和 美国，在很多方面美梵也有天然的合作前景，双方的关系趋于稳定。

第三章 从“神圣同盟”看美国的外交政策

从1981年到1989年的近十年间，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结成了神圣同盟，这一时期跨越了美国与梵蒂冈再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历史片断，这不是一个巧合。曾经揭露“水门事件”的美国著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1992年2月24日出版的《时代周刊》（*Time*）上发表了题为“神圣同盟”（*The Holy Alliance*）的文章，披露了美国梵蒂冈为推翻波兰社会主义制度而订立的“神圣同盟”的内幕。对于美梵“神圣同盟”的分析研究不多，但是许多研究在提到伯恩斯坦的文章时，大多肯定“神圣同盟”一文的真实性。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与梵蒂冈建立神圣同盟的基本目标是秘密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对前苏联形成压力，并试图使东欧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搞垮苏联。如果把这四点作为不同目标的话，那么可以说前二者达到了，而后二者与美梵“神圣同盟”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联系，“神圣同盟”并没有达到目标。

美国当局介入这一工作的官员有凯西（William Casey）⁷⁷、艾伦（Richard Allen）⁷⁸、克拉克（William Clark）⁷⁹、黑格（Alexander Haig）⁸⁰、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⁸¹以及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等人，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都认为同梵蒂冈结盟，可以称作“神圣同盟”，就是把教皇的道德力量、教会的宣教和美国强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机器、美国的民主结合在一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里根同样坚信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的实践运用是有益的。里根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因为他既相信华盛顿同梵蒂冈结盟能够得到好处，也知道结盟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里根认为，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然后再与之结盟。⁸²从实际结果来看，美国与梵蒂冈在神圣同盟的合作确实对于美梵走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异床同梦的合作

1981年底，当美国和梵蒂冈在波兰问题上相遇的时候，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出于共同的目的和一致的利益，它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当波兰政府宣布进行军事管制的时候，美国与梵蒂冈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一边。

一、美国的战略方针与支持团结工会的行动

早在华盛顿和梵蒂冈签订旨在保护团结工会的“神圣同盟”之前，美国就利用了波兰在1981年12月13日宣布军管的时机，进行密切联络。

当波兰执行军管的治安警察走上街头时，里根给教皇打了电话，询问教皇的

意见。接着里根在一系列的会议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总统办公厅和国家安全会议后，黑格派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尔特斯作为大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以便完成“特殊使命”。沃尔特斯抵达罗马后，会见了教皇和红衣主教恺撒罗里（Casaroli）。双方一致认为，团结工会之火不能就此熄灭，必须把苏联孤立起来，对波兰政府既要施加强大的道义压力，也要施加一定的经济压力。

在军管之后的最初时期，里根布置了命令：要通过美国的情报机构和人员，其中包括波兰国防部副部长，使教皇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波兰国内的详情，并且美国不断向教皇通报从在波军总参谋部工作的中央情报局情报员里沙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那里获得的情报。里根说：“我们现在掌握的全部情况，教皇也已都知道。”⁸³这种信息共享情报互惠的行动，对于两个还处于无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来说是罕见的，因为这种分享情报所需要的相互信任是很高的，要求两国相关利益的一致程度也是很高的。

里根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经常开展秘密行动（包括对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为起义者提供“死亡援助”，诸如武器、雇佣军、军事顾问、炸药。而在波兰，由于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的不同，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一位美国分析家说：“就波兰而言，教皇和总统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他们所干的就是利用国内对立势力的矛盾，制造内部冲突，自己却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⁸⁴

为了破坏苏联经济，削弱苏联同经互会国家的经济联系，并迫使苏联帝国的内部改革，1982年上半年美国还制订了一个“五点战略方针”。应该说，战略方针的提出是里根政府一系列构想的具体化综述，而这些构想是里根政府自执政以来就逐步形成的。构想这一战略方针后，美国和梵蒂冈必然走得更加接近，合作更加深入，这成为“神圣同盟”成立的一个基础，也为美国承认梵蒂冈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再与之结盟打下了基础。

1982年在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举行会见之前两星期，里根总统又签署了一个秘密指示（编号为 NSDD32），批准在东欧各国采取经济、外交和其他秘密活动，以抵消苏联控制东欧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涉及的是要在波兰采取行动。这项秘密指示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波兰政府的稳定执政，其手段是帮助团结工会的秘密行动，推进人权，主要是进行宗教活动和宣传同天主教会活动有关的权利，施加经济压力和从外交上孤立共产党政权。这一文件指出，需要在整个苏联帝国范围内提出保卫民主权益的口号，尤其是要加强宣传和在东欧地区组织地下的广播电台。⁸⁵

二、梵蒂冈对团结工会的支持

波兰共产党在团结工会活动了16个月后进行军事管制，对于天主教徒如此众多的波兰和宣称倡导民主的教皇来说，这种政治措施必然导致波兰政府同教会

发生公开的冲突。恺撒罗里说：“……在美国同梵蒂冈之间出现了利益近似的实际情况。”⁸⁶

军管后，波兰同世界上非共产党国家的电讯联系完全被切断，团结工会的6000多名活动家被拘留，其中有数百人被指控为犯了颠覆罪和反革命罪，9名矿工被打死，团结工会被取缔，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转入地下。在美国为瓦文萨（Lech Walesa）提供避难场所的同时，教会给许多团结工会的成员以保护，让他们或躲进教堂，或躲进祈祷所里面，或者一起呆在神甫家中避难。

同时教会在努力控制波兰的局势。教会领导人努力创造条件，为了防止苏联的军事干涉，要求团结工会行事低调。教皇本人也会见美国官员，同他们商讨波兰形势，以及美国在波兰开展活动的情况，并把自己的看法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方式传达给里根。每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出访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时候，差不多每次都是先到罗马，首先同教皇会见，交换情况。此外，华盛顿同梵蒂冈之间最重要的联络官还有沃尔特斯。沃尔特斯穿梭于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进行多次秘密访问，为总统和教皇传递各种信息。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教皇通过波兰教会向瓦文萨传递了旨意，要瓦文萨坚持地下斗争，要他告诉一千万团结工会会员，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招致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干涉，也不要同国内的公安部队正面冲突，以免导致内战。

由于共产党政权切断了波兰同梵蒂冈的通讯联系，若望·保禄二世通过无线电台与波兰红衣主教格莱姆普进行了联络。他向波兰派出了几名特使，以便从波兰国内获得直接的详细报告。黑格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梵蒂冈获得的信息肯定比我们获得的既准又快。虽然我们也有获得信息的良好渠道，但要送到我们手里，时间较长，因为这些信息要通过官僚式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处理。”⁸⁷

从美国和梵蒂冈两国在正式接触之前采取的行动来看，两国之间对于团结工会的支持和信息分享已经超出了两国之间简简单单的无外交关系的程度。

第二节 “神圣同盟”的运作

一、“神圣同盟”首脑会晤

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梵蒂冈皇家图书馆第一次会见，他们交谈了50分钟。而在图书馆楼同一个套间的另一侧，红衣主教恺撒罗里和大主教西尔维斯特里尼（Silvestrini）正在同美国国务卿黑格以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举行紧张的会谈。他们讨论的内容首先涉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今天已是第二天了。黑格说，以色列总理向他保证，以色列军队不会深入黎巴嫩国土40公里以上。关于中东局势问题，

里根和教皇只谈了几分钟时间，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波兰问题和苏联在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在这次会见中，里根同教皇商定，为了对苏演变要采取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行动。⁸⁸

显而易见的，由上可以看出美国与梵蒂冈之间对于发生的波兰军事管制的重视程度。对于中东局势问题——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这个热点仅仅谈了几分钟，而对于波兰问题则用了 50 分钟中除这几分钟外的一大段时间，对于波兰问题的重视远远超过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这个热点。波兰问题成为美梵“神圣同盟”首脑会晤的讨论重点，厉害关系可见一斑。应对苏联在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选择在波兰集中展开这一行动，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一是因为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东欧的大国，其影响力非同一般，如果波兰出现了什么新的形势、变化，示范效应将是巨大的，这点在 1989 年东欧剧变的时候体现出来了。第二，波兰是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故乡。对于若望·保禄二世来说，自然有浓厚的感情意义。当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皇的时候，波兰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天主教化的国家，据克格勃估计 90% 的人是天主教徒。⁸⁹第三，波兰实行军事管制之后，使美国介入有了理由。美国 1982 年上半年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针对前苏联的具体体现。对于东欧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的这种动向，美国正需要乘虚而入。第四，在 1981 年底波兰实行军事管制之后，美国与梵蒂冈相互交换情报信息，有了不约而同的初步合作，这为进一步通力合作打下了比较坚固的基础。

“神圣同盟”的历史任务完结之后，里根本人回忆时这么说：“我们两人感到，在雅尔塔会议上西方犯了大错误，现在应该得到纠正。”“团结工会是使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恰当工具。因为这是工人组织，在东欧地区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象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这个工会组织与苏联人和波兰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工会是格格不入的。”⁹⁰波兰团结工会的“前途”，是美国和梵蒂冈都深深关注的。

里根和教皇相信，如果梵蒂冈和美国合作，采取措施破坏波兰政府，并努力保护在 1981 年实行军管以后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使之发展壮大，那么可以把波兰从苏联卫星国的轨道上拉出来。“神圣同盟”首先要做的是使团结工会存活下去并重新获得合法化。

二、对团结工会存继支持的目标

团结工会在波兰被军事管制以后，暂时还处于地下状态，要保存其组织，必须依靠里根和教皇组建的地下交通网络来提供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美国和梵蒂冈通过波兰当地的神甫们、美国特务、劳联产联在波兰的代表处以及欧洲的工会活动家的帮助，向地下的团结工会运送成吨的设备。印刷设备、

传真机（波兰从此出现了首批传真机）、打印设备、影印机、发报机、电传机、电话机、短波发射机、录象机、照片扩印机，这些设备用于印刷、宣传、联络所需的，都被偷运到波兰，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提供给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所需资金可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民主基金会、梵蒂冈的秘密存款以及欧洲的工会组织直接拨款、秘密帐户流入团结工会。

在精神方面，梵蒂冈和美国对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下达的战略性指导意见，这些意见根据大量流向西方的关于波兰政府的国内决策和苏波外交关系的信息制定，基本上是通过波兰和美国的神职人员或者研究欧洲工人运动的西方专家转达的。这些建议都反映了里根政府和梵蒂冈的思考。教皇的一位亲密同事说：“如果问团结工会的表现如何，应当说，他们都非常聪明，在关键的时刻也没有（向当局）施加过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是受教会领导的。当然，我们有时也阻止团结工会，不让他们去干某些事情。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接壤的波兰，是一颗炸弹，它可以在共产主义心脏爆炸。压力大了，炸弹就会爆炸。”⁹¹

随着反对派力量的壮大，西方获得了关于波兰政府的内部情况以及华沙同莫斯科的各种联络情况。具体的信息不仅来自教士，也来自在波兰政府内部的间谍。大量流向西方的关于波兰政府的国内决策和苏波外交关系的信息，又为美梵研究做出的建议提供了大量资源。通过美国与梵蒂冈信息渠道的汇总，几乎可以掌握波兰动态的全貌。反过来，美国与梵蒂冈也把这些情况通过神职人员和波兰政府内部的间谍，转达给团结工会，来促进团结工会的复兴。

在情报信息方面，神圣同盟之前形成的情报互享体制进一步完善成了一种网络。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做得比梵蒂冈更为出色，然而关于对波兰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教会更有优势。在了解国内人们的情绪方面，在同地下的团结工会保持接触方面，没有任何其他人士或机构可以同教会相比。这一时期担任梵蒂冈副国务秘书的大主教西尔威斯特里尼说：“有关波兰的情报工作我们是安排得很周到的，因为主教们同圣都梵蒂冈和团结工会之间始终保持着接触。他们告诉我们监狱里的情况，团结工会的活动和它们需要什么，以及波兰政府的态度和内部分裂情况。”所有这些情报都及时告诉了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⁹²

三、美国的支持行动

美国方面，驻华沙大使馆变成了中央情报局对共产党世界展开活动的关键基地，是中央情报局最有效地开展活动的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团结工会提供了物质、技术援助和组织工作，并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出版地下刊物、设立电台和开展宣传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并建立了联络网等等；把社会党国际的一些成员拉过来支持团结工会，利用波兰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希望使教会与团结工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一起成为共产党制

度垮台之后主宰波兰的力量。

除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驻波兰大使馆这些官方机构外，美国当局利用美国劳联产联，也给团结工会提供了支持的最大保障。但是，劳联产联的官员们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向团结工会提供了多少援助，也不清楚美国政府在估价给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程度上有多少是依靠教会来完成的。美国工人运动同团结工会的关系很好，美国政府利用劳联产联的渠道提供资金来完成，由这个公开的组织来干，比采取传统的秘密行动要好得多。

向团结工会提供的许多物资，是通过海运运抵波兰的，往往是用伪装的集装箱，发货地点是丹麦或瑞典，然后抵达波兰的格坦斯克港或其他港口，雇佣那些秘密为团结工会服务的码头工人卸货。据美国官方确认，在向波兰运送物资方面，瑞典的社会党和瑞典的工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波兰码头卸下来的物资，一般都用卡车或私人小汽车运抵目的地。运送人员都是团结工会的同情分子，他们通常用教会或神甫的名义运送，送到接头地点卸货，再送到收货人手中。

四、梵蒂冈的支持行动

除了上面提到的提供所需的设备和偷运设备进入波兰的渠道、提供秘密存款和金融帐户汇款给团结工会的渠道，以及给瓦文萨的战略指导性意见外，教会给予的其他帮助还很大，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就公开而言，那就是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食品、资金、药品、和出没于教堂的医生。至于秘密的援助，那就是政治上的支持，组织秘密会议、组织游行示威等等。

“神圣同盟”期间，梵蒂冈把食品、衣服以及为被法院判刑的团结工会领导人支付罚金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往波兰国内。在波兰国内，神甫联络网的人员辗转于各个教堂之间，为那些躲藏在教堂里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传递信息。

教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用美国提供的印刷设备复印或转载团结工会的告同胞书，挂在教堂的布告栏内，规格统一的横幅标语堂而皇之地挂在警察局和公共建筑物上，甚至出现在国家控制的中央电视台进口处。

美国与梵蒂冈合作的联系也可以从美国的天主教主教穿针引线来观察。父亲出生在波兰的扬·克罗尔（John Cardinal Krol）是费城的红衣主教，曾经是美国宗教界同教皇关系最密切的神职人员。他也经常会见凯西，同他商讨如何帮助地下的团结工会和如何采取秘密行动。德尔温斯基（Dabrowski）说：“克罗尔在会见美国总统时，对波兰形势的分析，一般都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他同总统的会见，同国家安全会议成员会见，是经常的事。凯西和克拉克也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因为他对波兰国内的形势，真是了如指掌。”⁹³ 克罗尔的信息来源于梵蒂冈教会一线，他在美国与梵蒂冈之间也起到了两者之间连接的作用。

美国与梵蒂冈秘密支持团结工会配合如此默契，要想完全分清梵蒂冈所做的

与美国所做的已不可能。从前面物质和精神方面提到的支持，和美国借助一些梵蒂冈的渠道提供支持来看，双方的合作已到难以分清你我的地步了。

五、美梵支持下的团结工会的存继

有了美国和梵蒂冈这两个影响力巨大的权力中心的支持，团结工会保障了组织继续存在，并且在地下发展起来。根据卡拉蒂茨基（Karatnycky）的统计报告，当时在波兰出版的地下刊物有 400 多种，其中有些刊物的印数达 3 万份。⁹⁴诽谤政府的书籍、小册子，通常的印数达几千份。在教堂的地下室和普通人的家里，几百万人在观看录象的记录片，这些录象带都是由美国提供的录象设备大量复制的。

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成为一个国际性联络中心，它同梵蒂冈的代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同劳联产联，同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接触。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同凯西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的代表向他们的保护者提出什么东西最需要，那些物资应当送给谁，应当向谁提供资金援助等。神甫们、信使们、工会活动家、情报人员，自由地进出波兰，了解需要帮助的信息，通报关于波兰政府内部和地下的团结工会的详细情况。

团结工会利用了中央情报局和劳联产联秘密提供的电视设备用大功率不断干扰政府电视台的正常节目，在这些干扰性节目中，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团结工会依然活着！”的叫喊声。团结工会通过教会利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发射设备把官方的节目突然打断，播送自己制作的新闻，号召居民起来罢工或上街游行。

第三节 正常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

汉斯·摩根索在他的《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一书中分析联盟时提到，一个国家要不要实行联盟政策，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权宜问题。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无需援助，或者认为联盟义务负担可能超过期望得到的好处，它就会回避联盟。他还提到，并非每一项要求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共同利益，都需要通过联盟条约的法定条款来确定这种合作的条件。只有在这种共同利益尚未充分体现为政策和行动的情况下，才需要联盟条约来予以明确并使之起作用。⁹⁵

历史上的英美之间也没有明确结成联盟，因为英美两国的利益明确地要求政策和行动上的协调，用联盟条约的形式明文规定两国的利益、政策和行动显得多余。美国与梵蒂冈在波兰问题上相似于摩根索提到的 1823—1941 年之间的英美关系。美国在东欧的影响并不是强大到无需帮助，而是相对比较弱。在这一点上，

梵蒂冈对东欧人数众多、比例高的教会人口的影响力对美国在东欧发挥影响力很重要。《不战而胜》的作者、和平演变战略的鼓吹者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露骨地指出：“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这种力量”⁹⁶“思想有其自身的力量，我们可以使思想穿透屏障，一位波兰出生的教皇突出地说明了宗教信仰可以调动多大力量”⁹⁷美国与梵蒂冈两国在波兰问题上有着惊人的一致共同利益，这是两国无需明确的结盟盟约而能采取不约而同的政策和行动、并且最终形成“神圣同盟”的根本基础，关于美国与梵蒂冈在波兰的共同利益这一点在前文已经分析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摩根索还提到，带有意识形态因素的联盟，意识形态对联盟具有三种政治影响：使联盟成为不成功的联盟、增强联盟的力量或者削弱之。当意识形态因素加诸实际共同利益，便把精神信念和感情偏爱发动起来支持联盟，增加联盟的力量。⁹⁸说到“神圣同盟”这个词，就可以感到强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使人想起了1815年俄、普、奥等国建立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神圣同盟”宣称所有君主都信奉基督教原理，以上帝为世界的真正主宰。它带有“互惠效劳”、“不可改变的善意”、“相亲相爱”、“基督教博爱”、“牢不可破的兄弟友爱”等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特征。1982年开始的所谓美梵“神圣同盟”，也具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争霸，反对共产主义是美国的外交特征之一。梵蒂冈教皇出于“关注”东欧各国和苏联国内天主教徒，也极力支持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1982年所谓的“神圣同盟”的主要行动在于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这一点它做到了，至于反对共产主义、对苏东进行和平演变的目标并不是同盟所达到的。

1982年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合作的时，事实上都没有料到戈尔巴乔夫的上任改革和苏东剧变可能发生。许多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发的形势和激起的社会矛盾超过了苏联政府的控制。

从伯恩斯坦的文章也可以看到，并非是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的合作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首先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的合作的基本目标是维持波兰团结工会的存继，而不是推翻波兰现政府。美国与梵蒂冈提供的援助能够保持团结工会的存继，但是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最终还是波兰政府决定的。退一步讲，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有例子证明光光是援助反对派并不能到达美国干涉其他国家的目的：美国提供援助帮助伊拉克国内的反对派，并没有真正动摇萨达姆政权。其次，是苏联政府的表态促使波兰政府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了。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表示莫斯科赞同这样的看法：波兰政府如果不同团结工会合作就

不能行使政权。1989年4月5日，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双方签订了协议，要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并声明在6月举行议会大选。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的首肯，波兰政府是决不会使要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的。”当时东欧的卫星国已经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包袱，为了同西方接近，也有必要压卫星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示好。“不是这个同盟导致共产主义的垮台”。伯恩斯坦的文章得出和学者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相同的结论。

分析美梵所谓的“神圣同盟”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的是，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的合作确以东欧剧变这样一种结局为目标的，毋庸置疑，他们之间合作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目的是明确的。1987年2月，当华沙方面承诺要同教会开始对话后，里根总统宣布撤消美国对波兰的制裁。4个月之后，若望·保禄二世访问波兰受到了千百万同胞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一再要求尊重人权，一再赞扬团结工会。教皇先后在东欧各国任命反政府的宗教人士为主教。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还遍访东欧各国，其中1979-1990年间四访波兰，为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呐喊助威。“神圣同盟”的导向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不是推翻现政权，基本的目标是保存团结工会，以图以后发展壮大。如此迅速的东欧剧变，不是结盟双方所能预料到的，对此美国与梵蒂冈都没有准备。东欧剧变和里根政府换届以后，美国与梵蒂冈的“神圣同盟”就走到了尽头。

结论

宗教与外交天然具有某种联系，“宗教在本质上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和跨民族性的”。³⁰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也逐渐凸显出来。政治有国界之分而各大宗教是跨国界的，利益也是跨国界的，罗马天主教会为其全球信徒的利益会要求各国政府给予必要帮助。梵蒂冈对外交往中，不仅作为世界天主教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国家，这就决定了梵蒂冈对外交往的特殊性。宗教的自我界定使宗教团体相当关注本国的对外政策。基于宗教的无国界性，宗教利益团体也比较容易与国外本宗派教会进行沟通或发生“联接”，这使它们往往成为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来源。³¹ 由此梵蒂冈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交往国家的外交政策。宗教和外交的互动在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美国建国至今 200 多年里断断续续的美梵关系几经波折，从分析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宗教与外交关系的互动影响。梵蒂冈作为对外关系交往中的一个特殊对象，相似于正常的主权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与梵蒂冈关系中要考察特殊的宗教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美国与梵蒂冈这个特殊国家的关系，由于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同，就出现了波折起伏。美梵所谓“神圣同盟”具有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美梵的共同利益决定的，但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并不等同于推翻政权的行动，基本的外交手段、基本目标并不等同于长远的外交目标，在一致对苏东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上，这一意识形态的同盟不能说没有作用，只不过作用是有限的而非根本性的。如果把秘密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对前苏联形成压力、并试图使东欧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搞垮苏联作为美国与梵蒂冈建立神圣同盟的基本目标的话，只有前两者达到了，后二两者与美梵“神圣同盟”没有必然的直接因果联系。作为一种外部原因，美梵所谓“神圣同盟”并不是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

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一般是隐性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才显得显性，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与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关系中，不能不考虑宗教因素，但是宗教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全面的研究方面。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也有作为国家在外交中产生的作用。

梵蒂冈（罗马教廷）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也由于其对于教义领导下的各国天主教会的影响而变得复杂。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反过来也影响到美国天主教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表达，并且也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注重宗教因素与国际关系的关联，客观分析其间的互动规律，并由此制定国际互动中的文化策略，对应对国际宗教影响，扩展宗教的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

效应和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全发展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尝试做的美梵关系研究，希望引起学者们对外交和对外关系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进一步的思考，尤其是对如何看待梵蒂冈对外交往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思考，不断拓宽研究的新维度。

注释

- ¹ Samule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86-87.
- ² Kenneth 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7)
- ³ Allen D. 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American Policy* (Knoxville, Ten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中文译本见艾伦·D·赫茨克著, 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宗教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⁴ Eric O. 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⁵ Peter C. Kent & John F. Pollard ed., *Papal Diplomacy in the Modern Age*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 ⁶ Robert A. Graham, S.J., *Vat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 ⁷ [美]W·赫勃格著, 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1998。
- ⁸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 ⁹ A. James Reichley: *Religion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
- ¹⁰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7)
- ¹¹ 在本文中, 考虑到罗马教廷统治区域复杂的变迁历史, 为了统一, 以梵蒂冈指代罗马教廷, 而非仅指特定的梵蒂冈城国。
- ¹² 梵蒂冈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活动、美国天主教会的活动可以归入此类, 另外在历史上多见的教职人员与政府官员因私交关系而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也属于这一类。
- ¹³ 美国独立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全民性的命运感, 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将宗教视为维系公共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工具成为美国政治家的共识。宗教对美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表现在宗教的神学观点与其他因素一起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思想: 为大多数美国人接受并认同的关于有条件服从与反抗的权利的观点; 培养了美国人的民主精神; 创造了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具体操作层面, 当美国与梵蒂冈结成的所谓“神圣同盟”时, 美国里根政府中联系、负责这一事务的官员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 ¹⁴ 在美国, 宗教团体在选举过程中会就它们关心的问题询问各位候选人, 然后向大众通报,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选民了解各候选人在这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它们的立场一致, 借此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宗教团体或个人还采取直接行动, 为某位候选人助选, 拉拢选民。宗教团体还对“政治精英”进行游说活动, 或者采用更为直接的合法或非法的活动来影响大众, 或构成一种宗教舆论, 以此带来对政治机构的压力。关于美国宗教游说国会的研究, 具体可以参见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一书。
- ¹⁵ 1980年, 代表美国社会世俗保守派的里根在大选中得到了宗教右翼领袖杰里·福韦尔领导的“道德多数派”的支持;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 “在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私立学校学费贷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 在宗教右翼提出的所有热点上都明确表了态。另外在总统上任后任命官员和法官上也产生影响。例如, 里根当选总统后, 为了回敬基督教新右派在大选中对他的支持, 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任命了几位基督教新右派人士担任政府职务。右翼领袖理查德·维格里的助手莫顿·布莱克韦尔担任了里根的宗教事务顾问; 反堕胎运动的领导人 C. E. 丘伯担任了卫生福利部部长助理; 上帝会的詹姆斯·瓦特的职务相当于内务部长; 道德多数派的董事罗伯特·比林斯成为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另外里根政府在1984年撤回了对他们自己提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的人选的支持, 其部分原因是宗教保守势力抱怨说这位被提名者属于赞成堕胎的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

- ¹⁶ 卓新平著:《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 ¹⁷ 冯特君、宋新宁:《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
- ¹⁸ [美]L.M.霍普夫:《世界宗教》,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 ¹⁹ [英]乔治·布尔著,郭文豹、程洁译:《梵蒂冈内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 ²⁰ 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 ²¹ 杨运忠:《新帝国——21世纪美国全球称霸的理论范式》,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第3页。
- ²² 美国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全球主宰性的空军,惟一的、真正的远洋海军,以及在全球投放打击力量的独一无二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在质量上比在数量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军事研发的支出上,美国三倍于仅次于它的六大军事强国的军事研发支出的总和;换一个角度来衡量,美国目前的军事研发支出比德国或英国的全部国防支出还要多。在国际政治的现代史上,没有其他国家曾达到过像美国这样的超强军事地位。
- ²³ 斯蒂芬·G·布鲁克斯、威廉·C·沃尔福斯著、辛本健编译:《新的罗马帝国?——透视美国的霸权地位》,载《国际论坛》,2002年11月,第4卷第6期,第71页。
- ²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页。
- ²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7页。
- ²⁶ 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总览》东方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9页。
- ²⁷ 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 ²⁸ 布占姆等:《美国的历程》,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版,下册第547页。
- ²⁹ Mark Clayton *Scholars Get Religio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6,2002.
- ³⁰ [美]肯尼思·D·沃尔德,段琦译:“宗教团体对中美关系进展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3页。
- ³¹ 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 ³²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1995, p.69.
- ³³ [美]梅尔利·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风译:《杰斐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45页。
- ³⁴ 董小川著:《20世纪美国宗教和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 ³⁵ 转引自刘澎著:《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55页。
- ³⁶ R·G·哈切森著:《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更早地,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也有过相似地表达: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作政治设施中的最重要设施。《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 ³⁷ 刘澎著:《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 ³⁸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1995), p.28.
- ³⁹ 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 ⁴⁰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 p.62.
- ⁴¹ Charles W. Dun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log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84,p.161.
- ⁴² Pierard, RV, Linder, R.D.: *Civil Religion&the Presidency*, Michigan 1988,pp.17.
- ⁴³ Edwin S. Gausta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ligion in America. Since 1865",p.120.
- ⁴⁴ James E. Wood, Jr. "Religion and Politics", Texas 1983,pp.63-65.
- ⁴⁵ Boston, R. "Why the Religious Right is Wrong, about Separation of Church&State" Buffalo

New York 1993, pp.55, 172, 64.

⁴⁶ Andrew Kohut, John C.Green, Scott Keeter, and Robert C.Toth, *The Diminishing Divid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2000, p80.

⁴⁷ Bir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p.25.

⁴⁸ [美]W·赫勃格著, 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第 133 页。反对天主教言论的著作也不少, 矛头明确指向了罗马教廷, 比如 Samuel F. B. Morse: *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⁴⁹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275 页。

⁵⁰ [美]W·赫勃格著, 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第 147 页。

⁵¹ 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 载《史学集刊》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第 61 页。

⁵² 同上。

⁵³ 潘剑:《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21 卷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⁵⁴ Richard V. Pierard, "Cacophony on Capitol Hill: Evangelical Voices in Politics", in Stephen Johnson and Joseph Tamney eds. *The Political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view: Boulder, Colorado, 1986), pp.74-75.

⁵⁵ WASP 的原文是 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 意即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 是美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之前社会主流文化模式, PCJ 的原文是 Protestant-Catholic-Judaism, 意即当代美国主流文化是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位一体的, 这是 W·赫勃格的著名论断。间引自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 载《史学集刊》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⁵⁶ Eric O. 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67.

⁵⁷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

⁵⁸ 麦克斯·J·斯基德摩, 马歇尔·C·特里普:《美国政府简介》,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第 70 页。

⁵⁹ William J. Keefe and Morris S. Ogal, *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Process: Congress and the States*, 9th ed., NJ: Prentice Hall, 1997, pp.142-143.

⁶⁰ "Religious Affiliation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anuary 4, 1997.

⁶¹ 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第 349 页。

⁶² 该法使促进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以基督教义为信仰的美国通过这类法案自然不会放弃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感和宗教民族主义, 对于世界的影响还有待于观察。该法在国务院设立了一个新办公室, 并责成国务院就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发表年度报告。该法还要求国务院列出那些进行或容许特别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国家, 并设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作为监督国务院和总统的机构, 并确保两者有力地执行立法。

⁶³ Robert A. Gramham, S.J.: *Vat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82.

⁶⁴ Ibid, p.83-84.

⁶⁵ 刘澎:《美国与梵蒂冈外交关系》, 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 1992 年 12 月。

⁶⁶ Seymour Martin Lipset,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334.

⁶⁷ A. James Reichley: *Religion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219.而在肯尼迪竞选总统的选举中, 东部、中西部、南部、西部支持肯尼迪的天主教徒比例分别高达 77%、81%、75%、74%, p.224.

⁶⁸ 转引自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p.92.

- ⁶⁹ 有关梅隆·泰勒的作用，具体可以参见 Robert A. Gramham, S.J.: *Vat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326-348.
- ⁷⁰ 单新平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7页。
- ⁷¹ H. J. RES. 316
- ⁷² "Lugar Calls For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Vatican." Press release. Office of Senator Richard Lugar, July 21, 1983.
- ⁷³ "OSV/Gallup Report: Diplomatic relations supported." February 26, 1984.
- ⁷⁴ <http://www.mosquionet.com/~prewett/holyalliance1of2.html> 或另见 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February 24, 1992
- ⁷⁵ <http://www.lpca.us/us%20and%20vatican.htm>
- ⁷⁶ 这一点和克林顿竞选纲领和克林顿政府改革有关，客观上造成美梵在这一问题意见难以统一。
- ⁷⁷ William Casey, 里根政府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 ⁷⁸ Richard Allen, 里根政府时的第一任国家安全助理。
- ⁷⁹ William Clark, 里根政府时的国家安全助理。
- ⁸⁰ Alexander Haig, 里根政府时的美国国务卿。
- ⁸¹ Vernon Walters, 美国国务卿黑格任命的觐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特使。
- ⁸² <http://www.mosquionet.com/~prewett/holyalliance1of1.html> 或另见 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February 24, 1992
- ⁸³ Ibid.
- ⁸⁴ Ibid.
- ⁸⁵ Ibid.
- ⁸⁶ Ibid.
- ⁸⁷ Ibid.
- ⁸⁸ Ibid.
- ⁸⁹ 克格勃绝密档案:《波兰教皇和团结工会的兴起》
- ⁹⁰ <http://www.mosquionet.com/~prewett/holyalliance1of1.html> 或另见 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February 24, 1992
- ⁹¹ <http://www.mosquionet.com/~prewett/holyalliance1of2.html> 或另见 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February 24, 1992
- ⁹² Ibid.
- ⁹³ Ibid.
- ⁹⁴ Ibid.
- ⁹⁵ [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 ⁹⁶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领导人》，转引自刘洪潮主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106页。
- ⁹⁷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领导人》，转引自刘洪潮主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106页。
- ⁹⁸ [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 ⁹⁹ 参见(波)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 <困惑者纪事>(三)》，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第70页。

参考文献

中文书目:

1. 艾伦·D·赫茨克著, 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宗教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2. 卓新平著:《宗教理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3. 冯特君、宋新宁:《国际政治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
4. [美]L.M.霍普夫:《世界宗教》, 知识出版社, 1991年
5. [英]乔治·布尔著, 郭文豹、程洁译:《梵蒂冈内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年
7. 董小川著:《20世纪美国宗教和政治》,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8. 刘澎著:《当代美国宗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9. [美]R·G·哈切森著, 段琦、晓镛译:《白宫中的上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10. [美]W·赫勃格著, 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1998
11. 单新平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年
12. 孙尚扬著:《宗教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3. 刘洪潮主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4. 《现代美国百科全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年
15.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年

中文论文:

1. 金宜久: 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 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2年第9期
2. 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 载《史学集刊》第1期, 2002年1月
3. 潘 剑:《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 2002年1月
4. 刘中民:《论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载《欧洲》1996年第5期
5. 吕其昌:《美国宗教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载《国际论坛》第5卷第1期, 2003年1月
6. 董小川:《美国宗教与政治》, 载《呼兰师专学报》, 1999年第3期
7. 冯春风:《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现状》, 载《世界宗教研究》, 2000年第3期
8. 沈碧莲:《宗教解读美国政治的新视角》, 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2年第8期
9. 梁丽萍:《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 载《国际问题研究》, 2003年第5期
10. 刘 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载《美国研究》, 1997年第4期
11. 王 波:《宗教与美国政治——对美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剖析》, 载《南京师大学报》, 1999年第1期
12. 时殷弘:《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 载《世界历史》, 1997年第6期
13. 徐以骅:《关于美国宗教》,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6期
14. 陈志平、何立编译:《美国天主教中的主要派别及现状》, 载《世界宗教资料》, 1991年第1期
15. 徐以骅:《美国生活》, 载《现代美国百科全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年
16. [美]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载《美国研究》, 1998年第4期

英文书目:

1. Peter C. Kent & John F. Pollard ed., *Papal Diplomacy in the Modern Age*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2. Eric O. 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Press, 1987)
3.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7)
 4. James Hennessey, S.J., *American Catholics—A Histor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1)
 5.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6. Charles W. Dun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log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84
 7. Seymour Martin Lipset,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8. Robert A. Graham, S.J., *Vat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9. William J. Keefe and Morris S. Ogal, *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Process: Congress and the States*, 9th ed., NJ: Prentice Hall, 1997
 10. Pierard, RV, Linder, R.D., *Civil Religion & the Presidency*, Michigan 1988
 11. James E. Wood, Jr., *Religion and Politics*, Texas 1983
 12. Boston, R., *Why the Religious Right is Wrong, about Separation of Church & State*, Buffalo New York 1993
 13. Andrew Kohut, John C. Green, Scott Keeter, and Robert C. Toth, *The Diminishing Divid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2000
 14. Mary T. Hanna, *Catholics and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 Catherine L. Albanese: *American Religions and Religion*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 1985)
 16. Allen D. 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American Policy* (Knoxville, Ten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17. Peter L. Benson and Dorothy L. Williams, *Religion on Capitol Hi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19. Kenneth 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7)
 20. A. James Reichley: *Religion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英文论文:

1. Mark Clayton, "Scholars Get Religio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6,2002
2. John C. Bennett, "Moral Tens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Kenneth W. Thompson, ed., *Moral Dimens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 1984).
3. Richard V. Pierard, "Cacophony on Capitol Hill: Evangelical Voices in Politics", in Stephen Johnson and Joseph Tammy ed., *The Political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view: Boulder, Colorado, 1986)

其他资源:

1. "Religious Affiliation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anuary 4, 1997
2.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
3. 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February 24,1992
4. Bir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5. 全国天主教主教协会/美国天主教协会网站(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U.S. Catholic Conference): <http://www.nccbuscc.org>

后记

放下我的笔端，完成论文之后有一种怅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写论文的痛苦，也只有在完成论文之后才能感受种种感触。

学习国际关系专业已经三年，希望能都在这论文里面结出三年学习之果。在此我首先想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徐以骅教授。几年来，徐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点点滴滴的教诲令我感激万分，不敢相忘。从选题立意到谋篇布局，从材料选择到遣词造句，徐老师都给了我悉心的指导。这些都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也感谢院系各位老师，你们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终身受益，有你们的关心和爱护，才有我的不断进步。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含辛茹苦的培养和不计回报的支持，没有他们不断的鼓励和无私的关怀，恐怕我也不能顺利地完

成这篇论文。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_____ 日期：_____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_____ 导师签名：_____ 日期：_____

试论美国与梵蒂冈关系

作者:

[包军](#)

学位授予单位:

[复旦大学](#)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5194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d5a132e6-14f1-4b86-8596-9e4d0097ee4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